



□ 焦晶娟

近日，一网友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登山视频，因背包和上衣吊牌未摘被网友揣测是“恶意退货者”，意外遭受网暴，一些私信和评论攻击这位女士的面容、家乡，称其为“吊牌女”“吊牌战士”。

为了自证，该网友出示了购买记录，解释背包是今年9月买的，早就过了退货期限，漏摘了一个吊牌。衣服是2023年买的，吊牌附有寻亲的公益广告，觉得挺有意义才没摘。新的质疑声又响起来，有人说她蹭流量，“有什么好解释的”；有人用“个人常识”反驳，“谁家衣服两年不洗”。看到这位女士拍下的寻亲吊牌内容，又有人评论，“失踪时间2021年，现在2025年，这个照片有什么用”。

电商普及的今天，一些故意不摘吊牌“蹭穿”继而退货的行为确实给商家和其他消费者带来损失，这种“薅羊毛”行为应该批评。一个曾经质疑过“吊牌女”的人写道：“我开了100枪，其中有一枪不小心误伤了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开枪”这一比喻，令人背后一凉。他很清楚自己的“评论”正在伤害别人，

事件观

别让网暴戴着“正义”面具横行

但这种守护所谓“正义”的方式，真的“正义”吗？

综观近年来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网暴事件，领头的一些人会把具体的人抽象成一个“道德失范”的“靶子”，剥离事件具体语境、去掉前因后果，再“添油加醋”一些个人想象，以便达到所谓“伸张正义”的效果。于是染了粉红色头发的郑灵华被贴上“陪酒女”“摆拍”的标签；武汉一小学生在校内遭遇交通事故后，母亲因妆容精致，被说成“没有失去孩子的悲伤”。

正义不是粉饰强权的装饰品，也不是发泄情绪的工具。“惩恶扬善”这一朴素正义观的问题在于，误认为事物的属性是静止不变的，正义就是让好的更好、恶有恶报。那么谁来定义“善”与“恶”？在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强者就是正义”的丛林逻辑？

一些人口中所谓的“正义”，常常脱离了事件本身，成为一个为受害者精心设计的、让他们无法自证的陷阱。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极端的“键盘侠”行为与自恋、精神变态、虐待等人格倾向有关。

性格偏执的人终究是人群中的少数。那么“道德审判陷阱”，为何能引发更多普通人的跟风呢？另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统计了新闻论坛2600万条发帖，发现样本里四分之一的“恶评”来自从未发布过此类内容的用户，而负面情绪和论坛里不友善的氛围会显著增加这些用户发表恶评实施网暴的概率。

法学教授罗翔认为，人们容易对他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原因是，“这能够满足我们想象中的道德优越，甚至可以掩盖我们事实上的道德败坏”。

更多时候，我们对于新闻当事人的想

象，正是我们自身困境的投射。需要明确区分的是，当我们批评“特权”时，我们是追求“公平”，还是因为“享受特权的不是我”；当我们指责“吊牌姐”，是真的在帮商家挽回损失，还是觉得相比于“羊毛党”，自己消费能力更强。

网络舆论的珍贵之处在于，作为社情民意的“实时晴雨表”，它让更多普通民众拥有了便捷的表达途径。无论是“油罐车”事件中对食品安全底线的维护，还是广西“亮证威胁”风波中对滥用公权力的质疑，面对社会公共事务，网络舆论的理性监督搭建起群众与治理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要警惕的是，网络表达的匿名性和即时性，也让极端表达的传播变得成本低廉。基于算法的信息推送机制，让这些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极端意见有了更多曝光机会。“恐惧”“悲伤”“愤怒”更容易驱动群体共情，也更容易构成谣言和八卦

滋生的土壤。

社交媒体不断模糊着公共讨论和私人话题的界限，当网友习惯用放大镜去审视私德，“道德围猎”的目标正从公众人物延伸至普通人。网络对个体经历的放大，时常会让人们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仿佛远方一个陌生人微小的“瑕疵”，就会影响到屏幕外我们的现实利益，仿佛只有攻击这个瑕疵才是“正义”的。

但这种“正义”并无实际意义，即使我们通过辱骂一位顾客，让他剪下了商品吊牌，真实的获益者也并不存在，真实的伤害却发生了。网暴受害者即使身在家中，也难以逃离网络带来的痛苦和恐惧。

在“最快女护士”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是，“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很多人都能同时享有”。这种“共情”式的表达，在“乌烟瘴气”的论战中显得格外珍贵。就像在“吊牌事

件”当事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很多网友贴出自己没摘吊牌的玩偶、衣物，帮当事人解释，不摘吊牌并不是为了退货，有人是真的忘了摘，有人把吊牌当作“官方正品”的证明，有人是为了纪念那个送礼物的人。

这更接近正义的模样。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正义”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服从理性的统率，让自己灵魂中较好的部分控制较坏的部分，做到自身秩序井然，进而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吊牌事件”发生后，销售商品的企业向公众证实了公益寻亲吊牌的真实性，还赠送了当事人一套全新的滑雪服和帽子作为保留吊牌的答谢。商家解释，牌子设立寻亲吊牌的初衷，是希望人们能带着吊牌到达偏僻的山庄和村落，“也许未来3年、5年、10年，真的会有一个小朋友因为这个吊牌找到了回家的路”。

真相是对于谣言最好的反击。在当事人的社交媒体账号里，对她“恶语相向”的网友大多销声匿迹，不少拿着“道德大棒”想要展开新一轮“论战”的网友也扑了个空。与其匿名谩骂“惩罚”一个陌生人，不如摘下所谓“正义”的面具，直面自己的道德取向，用行动创造一个人人共享正义的世界。

上一动不动。

10岁的大女儿没穿外套就跑下楼接救护车。6岁的小女儿愣愣地坐在沙发上，看到了整个过程。

120急救电话的接线员问，病人还有没有呼吸。高俊的半张脸压在地上，只露出一半的鼻孔。王飞伸手探了探，说有呼吸。

但急诊入院时的病情显示：在到达现场后患者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呼吸音及心音消失。

王飞触到的可能只是丈夫的体温。“是我心里认为他有呼吸。”她小声说。

18点21分，医生正式宣告高俊死亡，死因一栏写着：呼吸心跳骤停综合征。这是一种致命的临床状态，常见的病因之一是急性心梗。

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霍晓川在他的科普视频中提到，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磨损，正常睡眠时，它能得到40%的修复，缺觉时，修复几乎停滞。“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会让猝死风险飙升。”他总结道。

高俊的葬礼上，来了许多人吊唁，和他的遗体告别。那个因观点不合而被拉黑的朋友一大早就来帮着写挽联。小毛从北京开车赶来。

她看到王飞强撑着场面，直到与她拥抱，在她耳边嚎啕大哭：“咋办啊，我俩妮儿都看见了。”

当王飞后来得知，丈夫的薪酬只有1000元一天时，更感到难以置信。广告导演田春鹏证实，高俊此前拍广告的费用是2~3万元一天（广告拍摄通常在1~2天内完成，前期筹备与后期工作不单独计费——记者注）。

亲友们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接受这个事实：在郑州，一个短剧副导演的薪资大约就是如此。

在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5微短剧从业者生态调查》中，当谈及行业困境，41%的受访者提到了福利待遇低。这与人们对短剧火热的想象并不相符。

开会1天，开拍4天，加上路费报销，刘爱国代表河南花贝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最终付给王飞6000元工资和1万元抚养金——“这个事儿仿佛是往我心上扎的一把刀。”王飞很难接受。她的工资每月还了房贷剩不下多少，已经停了两个女儿的机票课。

他认为丈夫应该得到更多赔偿。但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条件之一是“在工作场所内”。“视同工伤”的情形，也要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4天的拍摄时长，与甲方的投资金额、剧本集数、戏份难度、演员档期等多种因素相关，是通过严格的成本核算定下来的。作为制作公司，这是必须要算的一笔账。

短剧行业市场规模庞大，但利润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分配并不均衡——制作方为小，播出平台为大。据刘爱国了解，目前郑州的短剧公司大多是制作公司。

如果制作方与平台合作出品，就能参与分成。但如果只是根据平台要求完成制作，收取制作费，就只能通过严控成本来赚取利润——核算不当，就可能亏本。

刘爱国说，他的项目就是这样。作品上线后，即使流量可观，收益也与制作团队无关，良好的数据只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合作的机会。

杀青回家后，高俊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在阳台的工作桌前度过的。为了避免打扰妻女休息，他把客厅的帘子拉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大女儿看见爸爸躺在沙发上，没回卧室里睡。

当天中午，高俊给刘爱国发去几张剧照。这是杀青之后双方第一次交流。

“抱歉，这次做得不好，出乎自己意料……失误不断，估计前面睡得也不太够，从未有过的片场断线感觉。”高俊说，“无论怎么说，自己难逃责任，内心十分愧疚，辜负了刘导好意。”

刘爱国安慰了他几句。高俊主动提出要盯后期。“随时等候任务指令。”他发了个努力的表情。

差不多的时间，王飞给丈夫打了一通电话，让他中午自己弄饭吃。

两个女儿都在学校，她单位离家远，中午不回来。挂掉电话之前，她叮嘱高俊把冰箱里的牛肉拿出来解冻，晚上她回来炒菜吃。

高俊照做了，把肉放在厨房台面上给妻子拍了张照。

下午4点40分左右，王飞接上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女儿习惯性地喊：“爸爸，我们回来了。”

没有人应。那天开封下着小雨，天色昏暗。王飞发现客厅的灯开着，卫生间的门开着，灯也开着。她走过去，发现高俊趴在地上。

（应受访者要求，小毛为化名）

1

在同一个短剧剧组、共事了4个日夜的同事，得知副导演高俊已经死亡的消息时，翻出杀青时的合影，问：“是哪个？”

合影拍摄于10月18日深夜1点57分，在河南郑州，这个剧组刚刚结束一部“出海”短剧的拍摄。照片里的17个人多数面带微笑，包括两位说葡萄牙语的外国演员。前排右二站着的高俊，两天后在家中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去世。他43岁，个子不高，身形偏胖，笑起来面目和善，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卫衣，在一群年轻的面孔中相当显眼。这是他第二次进组拍短剧。

2

剧组杀青当天的下午3点左右，副导演高俊回到开封的家里，跟妻子嘟囔说脚疼，想去睡一觉。

他放下背包和行李箱，简单跟两个女儿打了招呼，进卫生间洗了把脸，脱下那件黄色卫衣，就进卧室睡了。

妻子王飞后来回忆，整个过程可能不超过10分钟。她一向很少过问和打扰丈夫的工作，只是帮他关上卧室的门，打开他的行李箱。

这个家庭在建立伊始，就有了明确的分工。高俊早年四处拍纪录片，拿了一些奖项，后来又拍广告，经常出差，行李箱多半是妻子帮忙收拾。

王飞知道这一次丈夫是去拍短剧，但她以为和拍广告没什么不一样。她把高俊每天要吃的降压药从箱子里拿出来，脏衣服丢进了阳台上的洗衣机。

洗衣机对面，是高俊的显示屏和导演椅。这个90平米的两居室空间有限，高俊就在阳台上给自己布置了一块办公区，装上遮阳帘，用绿植和鱼缸隔开。

王飞回忆，她随后接送女儿、熬粥备菜——直至晚饭做好，始终没有进卧室打扰丈夫。

这天上午8点51分，高俊还给发小余珂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失眠了。

“你怎么会失眠？”余珂有点纳闷。在他印象里，高俊入睡很快，且鼾声极大。他开玩笑说，跟高俊一起露营也要扎两个帐篷。

高俊在电话里回他，“熬得累”，压力大。

晚上7点40分左右，王飞做好晚饭，让孩子叫爸爸起床。餐桌边，一家人聊天时，高俊又提到脚疼。

王飞后来才知道，过去4天，丈夫在办公室、卧室、走廊、会议室之类的室内拍摄场景里，走了将近6万步。

但在那个小别重逢的傍晚，高俊没有细说，王飞也没太在意。她记得晚上丈夫处理了一会儿工作，就开始陪女儿练小提琴。

这几年，高俊作为传统广告导演的工作空间也在受到挤压。《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5)》佐证了这一点——传统媒体广告正在大幅下滑。

投放至互联网平台的广告项目被拆解得更零碎，精准投放给社交媒体、短视频博主制作，还有AI的冲击。4月，高俊在工作计划里多次提到，要了解AI视频技术软件、AR眼镜的技术等内容。

去年，据杨丰年了解，高俊还接过一部宣传片和一两支广告。今年似乎一个活儿

决定拍短剧之后，高俊下载了一个短剧App，浏览了300多部剧，完整看完7部。

他找到一家郑州的短剧公司跟组观摩。当时的工作节奏是“10天拍4部”，他认真写下对短剧的理解：“理解为大数据工作的本质”“理解时间与产出效率比的取舍概念”“理解内容比画面更为重要”。

在观察笔记中，他提示自己：“身体健康：不再有16小时或14小时概念（指传统广告行业的一日工时，超时工作将单独计费——记者注），这会有更多风险。”最后，他写下：“入局，不能被时代抛弃，寻求改变机会。”

在短剧的“时代”，高俊实际上已经晚了一步。观摩结束后，整整一个月，他都在等一个实拍的机会。一家短剧公司向他解释道：“现在新导演都是排队报到。”比起两年前，郑州的微短剧从业人员至少增长了5倍，已有近4万人。

7月1日，高俊联系此前相识的短剧导演刘爱国：“有什么工作机会别忘了兄弟，兄弟我要找工作。”

刘爱国自2023年起就在拍出海短剧。高俊曾在工作日志里提示自己：“海外市场没有国内市场这么卷，可能是个机会。”

“需要执行导演不？”9月25日，高俊再次问刘爱国。他们终于确定了合作，要拍摄一部出海巴西的短剧。剧本已经定好，改编自国内一部爆款短剧，共50多集，计划4天拍完，一个多月后上线。

面对这个机会，高俊竭尽所能地准备。刘爱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高俊没有问过他有关薪资待遇的问题。

高俊从来没去过巴西，也不懂葡萄牙语，就结合剧情在网上研究，巴西的黑帮混混是什么样，富豪又是什么形象。他给每个角色挑选了适合的着装风格，并附上服装的品牌和图片。

拿到剧本后，他提出许多异议：“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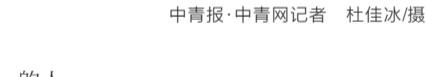
高俊家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家人的合影。画面正中为高母，高父几年前已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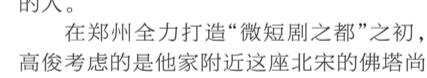
11月8日，王飞停了女儿的小提琴课，女儿在家里练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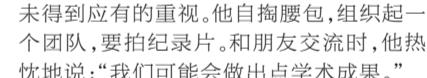
高俊家客厅的整墙书架上，摆放着高俊的相机和纪录片奖杯，还有不少关于电影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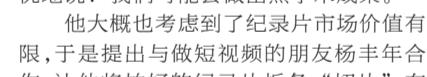
高俊的女儿拿着她的乐谱和画作，此前她在学习这两门兴趣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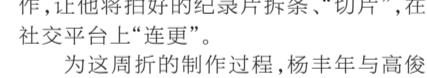
11月8日，高俊走后，妻子王飞帮他照看阳台上的小鱼，她正在清理鱼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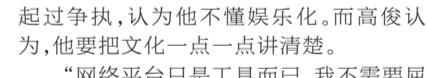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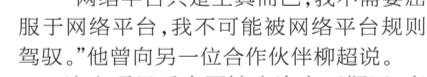
高俊在家中阳台为自己布置的办公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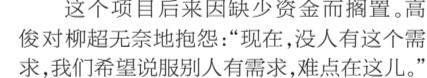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高俊在家中阳台为自己布置的办公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高俊在家中阳台为自己布置的办公区。

